

周斌武
選注

中國古代語言學文選

中國古代語言學文選

周斌武 選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1.6 插頁 2 字數 24,000

1988 年 8 月第 1 版 198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ISBN 7-5325-0549-9
H·10 定價：5.45 元

前 言

本書編錄古代語言文字學有關文字、音韻、訓詁等方面論著三十二篇，附錄兩篇。其中除許慎《說文敘》、郭璞《爾雅注序》、《方言注序》和陸法言《切韻序》，以及明儒陳第《毛詩古音考序》外，都是清代學者的著作，凡十二家，計二十七篇。

(一)

我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學，舊稱“小學”，蓋以成學之始基，童孩習之。在古代，小學的研究是隨着經學的研究而發展起來的。“治經必宗漢學”。漢代尊崇經學，推尚經術，漢儒用故訓以說經，且最重師法和家法。師之所傳，弟子之所受，雖一字而毋敢出入，這對後世學術傳播頗有影響。兩漢可謂經學研究的極盛時代。經學自漢代以後，由盛及衰，經過一千多年至清代而復盛。語言文字學也一樣，始盛于漢代，復盛于清代，在中國語言學史上形成了馬鞍形兩個學術高峯。清儒以漢學為正宗研究經學，旁通語言文字之學，好學之士，更僕難數。而一代學術和學風的轉變，亦往往與政治有關。清代經學和語言文字學的研究之所以盛極一時，都與當時政治形勢和時代特點密切相關。

自十七世紀四十年代起，福臨(順治)進關，滿清入主中

國。清初諸儒，多不忘種姓，有志經世。他們“不惜九死一生，以圖再造。及事不成，雖浮海入山，而回天之志終不稍衰”。（見《清史稿》卷五〇七“遺逸傳序”）當時，民族矛盾在文化學術領域裏的反映非常明顯，清初統治階級憑借政治上軍事上的專制淫威，一方面對漢族士大夫和知識分子階層大興文字、思想之獄，橫肆摧抑；另一方面，他們爲了消泯漢族人民的民族仇恨，又籠絡知識分子，崇儒尊孔，特重科第，給讀書人留下一條讀經治學的出路。在清統治者的刑罰殺戮名位利祿的利誘面前，許多知識分子苦節自處，遯世蓬門，讀書講學，甘爲遺逸以沒世。從學術本身的發展來看，明代由于選人偏重科舉，科舉又偏重時文，八股盛而《六經》微。時文所及，廢話連篇；一般學者束書不觀，游談無根，靡然成風。然而豪雋之士自然不安於固陋，他們潛心古學，都有根柢。明亡之後，學術界通儒輩出，如餘杭黃宗羲、昆山顧炎武、衡陽王夫之，以及陸世儀、張履祥、顏元等。黃氏“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顧氏“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究原委，改正得失”。王氏“著書凡四十年，其學深情無涯涘”。各家造詣雖不盡同，但經世致用的學術觀點是一致的。他們主張以實學爲務，反對空談義理，鄙視便辭巧說，力矯明儒空疏之弊，轉而研究“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對語言文字學的研究，以顧炎武爲代表，開創了一種謹嚴、踏實、實事求是、鍥而不舍的學風。由于學術風氣的轉變，學術研究引向一條新的航道，對後世學術發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

(二)

古書音讀，早已失傳，典籍雖存于世，而後人多不能通。清初諸儒于考釋古文化之時，亦致力於文獻的整理與古文字的研究。如顧炎武之治經即兼及訓詁音釋，旁通小學。他針對歷來擅自改經之病，著《音學五書》，指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答李子德書》）。為古韻學研究開導考古審音之先河。乾嘉時期，諸學昌明，通儒輩出，述作如林。惠棟、戴震諸儒，創立吳皖兩大學派，主倡經術，確宗漢詁。吳派錢大昕、王鳴盛、江聲等，開吳中之學；皖派戴、段、孔、王，精研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其時無論經學、小學、史學、考證和校勘學等都出現蓬勃發展的局面。

戴震早年受學於婺源江永，江氏通《三禮》，長於考據，并善于音理，精於審音，其學開皖派經學研究的風氣。戴氏後來講學京師，創皖南學派，對經學、天文、數學、史地等學無不精研，對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益加闡發。戴氏諸弟子，遞稟師承，博極羣書，治經之餘，精研語言文字之學，師友講習，淵源濡染，轉相發明，蔚然成風。他們學術活動的範圍極為廣泛，學術成就也遠勝前人。比如：孔廣森少受經於戴震，治《三禮》及《公羊春秋》之學，又傳其師測算之學，并習戴氏古韻學，亦有成就。戴氏知名弟子段玉裁、王念孫，號為經儒，皆有述作，而學術成就實際上在小學方面。關於這一點，章炳麟在《廬書·清儒》裏曾經提到。章氏說：

“始故明職方郎昆山顧炎武，為《唐韻正》、《易》、《詩本音》，古韻明。其後言聲音訓詁者稟焉。……自乾隆朝始，一自

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震在休寧，受學婺源江永，治小學、禮經、算術、輿地皆深通。其鄉里同學，有金榜、程瑤田，後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翬也，皆善治禮。而瑤田兼通水地、聲律、工藝、穀食之學。震又教於京師，任大椿、盧文弨、孔廣森皆從問業；弟子最知名者，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玉裁爲《六書音均表》以解《說文》，《說文》明。念孫疏《廣雅》，以經傳諸子，轉相證明，諸古書文義詰詘者皆理解；授子引之，爲《經傳釋詞》，明三古辭氣，漢儒所不能理釋。其小學訓詁，自魏以來，未嘗有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孫詒讓，皆承念孫之學，樾爲《古書疑義舉例》，辨古人稱名牴牾者，各從條列，使人無所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孫爲經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學。”

(三)

清代學者研究語言文字學，他們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以音韻學論，其成就主要在古韻學方面。自顧炎武開始，江、戴、段、孔、王諸家，承先啓發，以《廣韻》爲階梯，利用周秦韻文的用韻和形聲字的諧聲系統等材料，就古韻求古音，離析《唐韻》，爲構擬和重建上古韻母系統，確定古韻分部，不遺餘力。他們的學術成就，可以概括爲下列五個主要方面：一、認識語言是變化發展的，從“變”的觀點確立了“古今音異”的學說。二、創立了諧聲字聲符相同者古韻必同部說，明確了諧聲系統裏的音韻現象客觀地反映了上古語音系統的特點。三、創立了“古四聲不同今韻”說，爲古聲調的研究確立了歷史的觀點。

四、闡述了古韻系統裏陰聲與入聲、陰聲與陽聲的對應性，創立了單音節詞音節結構內部語音交替的學說。五、明確了古今聲紐的異同，爲上古聲母系統的構擬和研究提供了材料和證據。

顧炎武著《音學五書》，肯定了明儒陳第“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的理論。他在《音論》裏發揮了陳氏“古今音異”的理論和“詩無叶韻”之說；在《詩本音》裏，也採用陳氏“本證”“旁證”方法研究《詩經》韻部，分古韻爲十部。江永著《古韻標準》，繼承了“古今音異”的學說，認爲中古韻書“分部列字，雖不能盡合於古，亦因其時音有流變，勢不能泥古違今”。陳、顧、江三家對《詩經》押韻根本上否定了南宋以來“協韻”之說，指明所謂“隨意轉讀”那是毫無根據的。段玉裁著《六書音均表》，分古韻爲十七部，段氏分部的主導思想也是“音韻隨時代遷移”。他研究周秦古韻，發現諧聲系統和周秦韻文用韻的一致性，創立“同聲必同部”的理論，進一步證實諧聲系統確是研究周秦古韻的重要材料。戴震著《聲韻考》從分析《廣韻》入手，研究和區別中古音系的“等”和“呼”以及聲類異同，從而研究古韻學，創立“音轉”的理論，分古韻爲九類二十五部。後來孔廣森承其學，創“陰陽對轉”學說，分古韻爲十八部。王念孫致力於上古前期《詩經》韻類的研究，在段氏分部的基礎上，晚年確定認爲古有去聲，主張祭部獨立，并從脂部分出至部，列古韻二十一部，亦有發明。清儒對古聲調的研究，“古四聲不同今韻”這是各家所具有的共同概念，雖然，諸家各有見解，立論殊異，而觀點却是一致的。

至于古聲母系統的研究，有卓越成就的學者首推錢大昕。錢氏博極羣書，對古聲母的研究，材料翔實，立論精辟，對後學

深有啓發。嗣後鄒漢勛、章炳麟、曾運乾等諸家，亦各有發明。總之清儒研究音韻學，淵源流暢，薪傳不絕，承先啓後，轉相發明，既有師承，又有創新。他們的學術成就在中國語言學史上足以啓迪後生，嘉惠來者。

(四)

清儒研究文字學，多數致力於許慎《說文解字》一書的考釋和研究。另外，也有不少學者，注重古器銘文的考釋，從事古文字的研究。

清代學者治《說文》，可謂盛極一時，一直到清末，《說文》始終是學者們閱讀和研究的對象。清代文字學家除了對《說文》原著加以注解詮釋外，從考求文字的本義，一直到推究文字的源流，無論是漢字的形體結構、文字的形義關係，和“六書”的條例以及《說文》一書裏有關引經、逸字、讀若、聲系、語原等，幾乎都作了專題研究。另外，對《說文》的版本也有專著，并有雜論《說文》的著作。《說文》一書由于原本在唐代被人改動過，至後世不但古本亡佚，連改本也不傳。今傳徐鉉校定本《說文》，顯有刊落，且今本正文、重文，皆有益出，而宋以前舊本，不可復睹。清初，顧炎武對今本《說文》頗生懷疑。他認為《說文》所述與經傳古訓“未必盡合”，而後世學者對《說文》總“以爲盡得古人之意，然與否與？”并指出“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可謂善學《說文》者與”！

清儒治《說文》有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所謂四大家，論功力，首推段玉裁。段氏積數十年精力，撰著《說文解字讀》長編五百四十卷，後成《說文》段注一書。段注徵引審訂，既博

且深，對許書條例，多所發明。學者讀段書玩索求之，其例自見，這也是人所共識。章炳麟尤其推崇段氏爲《六書音均表》以解《說文》，章氏說：

“段氏爲《說文》注，與桂馥、王筠并列，量其殊勝，固非兩家所逮。何者？凡治小學，非專辨章形體，要于推尋故言，得其經脈，不明音韻，不知一字數義所由生。此段氏所以爲桀”（《小學略說》）。

但是，段注有缺點，改訂增刪，難免稍有主觀武斷。因此，《說文》段注問世之後，“人多求聞”，不少學者破除成見，不囿于一家之說，對《說文》段注便有《匡謬》、《訂補》、《箋申》、《札記》一類著述，比如王念孫有《說文段注簽記》等。這些著述也有助于讀者領悟段學之精審，“千慮一失”，無損于《說文》段注這部傳世杰作。

至于古文字的研究，有金文的研究和甲骨文的研究。清代金文的考釋和研究也比前代有發展，從金文的材料看，清代乾隆初，宮廷把所藏銘器仿宋人《宣和博古圖錄》印著《西清古鑑》。乾嘉期間，研究金文的學者就多起來，他們致力于銅器上的花紋和著錄的考釋工作，研究金文的學術著作也就不斷出現。一直到清末，王國維曾編《清代金文著錄表》，所錄銘器共 3,294 件。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對古文字的學術研究開闢了新的領域，無論是考訂《說文》或考訂金文以及研究古代史具有極其重要參攷價值。清末和近代研究古文字的著名學者，有吳大澂、丁佛言、孫詒讓、林義光、羅振玉、王國維、孫海波、朱芳圃、容庚、商承祚等。

(五)

清代學者對訓詁學的研究，有兩大特點：一是研究的方面廣。他們幾乎對古代每一種重要著作，都做了新的注釋。比如經學方面，惠棟撰著《九經古義》（十六卷）等書，對毛鄭傳注，既有發揮，也作補充。小學方面，戴震作《毛鄭詩攷正》、《孟子字義疏證》、《爾雅文字考》、《方言疏證》等書，皆稱精到。《爾雅》有邵氏《正義》、郝氏《義疏》，《廣雅》有王念孫《疏證》，《方言》又有錢繹《方言箋疏》，《釋名》有畢沅《疏證》等。

一是理論的探討深。各家治學，并不局限于古書的字義和文義的詮釋，對傳統訓詁學在理論上進行了探索和研究。他們通過治學和詮釋的實踐，不斷豐富了訓詁學的理論。比如，戴震主張通經必以小學為入門；以識字為讀經之始，以窮經為識義理之途。故治經必須研究語言文字。戴氏認為，文字學的研究，不僅在於考證，應當以考證為基礎，既有助於訂經，又能結合故訓、理義，把三者統一起來。指出：“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聖賢之理明。”戴氏又認為，小學雖分為三，而“字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與是仲明論學書》）。指出：義由音出，音隨義變的道理。戴氏的理論觀點奠定了清代訓詁學以聲音通訓詁的理論基礎。段玉裁發揮了戴震的學說，認為“治經莫重乎得義，得義莫切于得音。”進一步闡述了音韻是訓詁的樞紐。王念孫、王引之認為“詁訓之旨本于聲音”；“存乎聲音”。主張就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不限形體。採用“以聲求義”的方法，破經傳假借之字而讀以本字。指出：毛鄭“多易假借之字而訓以本字，已開‘改讀’之先”。王氏父子的理

論，進一步指明以聲音通訓詁的重要性。

清代訓詁學的成就，大體上可以概括為下列四個方面：

- 一、明確了音韻與訓詁的關係。訓詁學家能够根據古代實際語言的書面讀音來推尋故言，明確了古代書面語言裏字義與語義的關係，克服了訓詁上緣詞生訓的毛病。
- 二、漢儒訓詁，已涉及校勘，如《禮記》“緇衣”鄭注：“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古注所謂“當、為”者正是改正文字的形誤。這是依據上文的語義加以判斷的“校勘”，也是訓詁的一個方面，當然不如善本和古本等諸本互校來得可靠。清儒把訓詁和輯佚、校勘、訂正結合起來，以校勘為訓詁的第一步功夫，使古書本子完善可讀。
- 三、古代訓詁學家雖然只講字義，但詮釋必然要涉及語法問題。因為，在古人看來，“積字成句，一字之義果明，則數字之義亦必無不明”。漢儒傳注有“某，辭也。”“某，某貌”、“某，某然”之例，以及：“坎坎伐檀兮”，傳云：“坎坎，伐檀聲”。凡此等例客觀上是指明詞的性能和語法功用的。清代學者研究訓詁學，分明比漢儒更為精細，他們採用“體用”、“動靜”、“虛實”等術語來說明詞的語法意義。例如：段玉裁在《說文》木部“梳”字下注解說：“（梳，所以理髮也）所以二字今補。器曰梳，用之理髮，因亦曰梳。凡字之體用同稱如此。《漢書》亦作疏。”又《說文》“算”字下段注云：“（算，數也）“筭為算之器，算為筭之用。二字音同而義別。”為了說明詞在句子裏的詞性和語法關係，不少學者編撰了一系列辨字釋詞的專著，例如：王夫之《說文廣義》，袁仁林《虛字說》，劉琪《助字辨略》，王引之《經傳釋詞》、俞樾《古書疑義舉例》等。這類著作，或多或少接觸到古漢語的語法和修辭問題，成為後世研究古代漢語的語法和修辭的重要參攷資料。
- 四、清代訓詁學家的著述，無論

是輯佚、校勘和疏證，以及古方言學的研究，為古漢語詞匯學的研究積累了豐富的材料，提供了可靠的證據。這類著述為後世學者研究漢語的語源學和歷史詞匯學創造了條件，奠定了學術研究的基礎。

(六)

清代乾嘉時期，經學自吳、徽兩大學派主倡經術，確宗漢詁，江浙閩湘粵各地，翕然承風。戴氏學派，他們雖然采用漢儒注書的條例來注解羣書，但并不完全抄襲漢儒的說法。他們繼承了清初諸儒謹嚴、刻實、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研精覃思，研究語言文字學，尤其精于校勘，不厭其煩。篤于深求，恥于輕信。在治學方法上，強調徵實不誣，無徵不信。重客觀、重證據；憑心得不憑臆測，憑博徵不憑孤證，憑邏輯推理，不憑主觀臆斷。章炳麟說：“凡戴學數家，分析條理，皆參密嚴樞，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與蘇州諸學殊矣”（《廬書·清儒》）。戴學數家的治學態度和治學方法，足以啓發後學。他們不但在語言學領域裏取得了輝煌的學術成就，有功于後世，而且為清代樸學家研究經學和語言文字學創立了方法論原則。關於這一點，劉師培在《近代漢學變遷論》一文裏有所闡述。劉氏說：

“江戴之學，興于徽歙，所學長于比勘，博徵其材，約守其例，悉以心得為憑。且觀其治學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條，使綱舉目張，同條共貫，可謂無徵不信矣。即嘉定三錢（大昕、塘、坳），于地輿天算各擅專長，博極羣書，于一言一事，必求其徵。而段、王之學，淵源戴君，尤長訓詁，于史書諸子，轉相證明，或

觸類而長，所到冰釋。卽凌、程、三胡，或條列典章，或詮釋物類，亦復根據分明，條理融貫；恥于輕信，而篤于深求。徵實之學，蓋至是而達于極端矣”（《國粹學報》三十一期）。

由此可見，清代語言文字學的研究出現蓬勃發展的局面并不是偶然的。清代所謂小學家，斷非一藝一能之士，從顧炎武算起，實際上都是當時學問精博、造詣高深的經師，都是當時在學術上極其勤奮、有真知、有實學，有獨到見解的高明學者。他們從事學術活動，繼承了漢儒的傳統，遞稟師承，篤實謹嚴，敢于創新。他們承先啓後，轉相發明，不斷把學術推向前進。可以這樣說，清儒研究語言文字學，能尋漢儒之墜緒而繼宗風，取得卓越的成就。他們所創造的精神財富，也正是清代經學有功于後世的一個重要方面。

清初，顧炎武等以經世致用的學術觀點開創了謹嚴、刻實、實事求是的一代學風，把學術活動引向正確的航道，爲後世學者研究語言文字學指出了明確的方向。如何發揚清代朴學家治學的優良傳統和優良學風，接取他們學術研究的成果來推動語言科學的發展，使現代語言文字學的研究更具有時代性、現實性和科學性，這將成爲當前和今後從事語言文字學研究工作的學者必須考慮的重要課題。

本書的編選，在于爲學習中國古代語言學提供一種參攷讀本，供大學文科主要是語言文學系學生之用。俾使學生在掌握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基本知識之後，通過本書的閱讀參攷，加深古漢語的基本知識，提高古代語言文字學論著的閱讀水平，擴大知識面；並使學生能進一步掌握古代語言文字學有關文字、音韻、訓詁等方面的專業知識，瞭解古代語言學家的

學術觀點。並能掌握一些研究語言文字學的方法和途徑。

本書撰寫過程中，承蒙西北師範學院郭晉稀先生賜教，謹表謝忱。因選注者本人見聞譾陋，定多紕謬，尚希海內方家和廣大讀者匡正。

周 斌 武

目 錄

前言	(1)
說文解字敘	許 慎 (1)
爾雅注序	郭 璞 (23)
方言注序	郭 璞 (34)
切韻序	陸法言 (45)
毛詩古音考序	陳 第 (58)
音學五書序	顧炎武 (68)
五經中多有用韻	顧炎武 (77)
六書音均表序	戴 震 (84)
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	戴 震 (94)
論韻書中字義答秦尚書蕙田	戴 震 (106)
轉語二十章序	戴 震 (115)
與段若膺書	錢大昕 (124)
一字兩讀	錢大昕 (131)
古十七部本音說	段玉裁 (138)
聲類表序	段玉裁 (152)
王懷祖廣雅注序	段玉裁 (162)
周禮漢讀考序	段玉裁 (167)

廣雅疏證序	王念孫	(173)
說文解字注序	王念孫	(182)
與郝蘭皋戶部論爾雅書	阮元	(193)
附文：大戴禮記·小辨	孔廣森	(203)
釋相	阮元	(206)
寄王念孫書	江有誥	(216)
經籍叢詁序	王引之	(227)
經傳平列兩字上下同義	王引之	(245)
廣州音說	陳澧	(265)
墨子閒詁序	孫詒讓	(271)
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	王國維	(281)
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	王國維	(290)
說文今敍篆文合以古籀說	王國維	(294)
小學略說	章炳麟	(299)
轉注假借說	章炳麟	(318)
新方言序	章炳麟	(335)

附錄：

古今字音之變遷	錢玄同	(345)
轉注釋例	朱宗萊	(349)

說文解字敘

許 慎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1]，以垂憲象^[2]。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3]，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父，萬品以察，蓋取諸夫；“夫，揚於王庭”^[4]。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5]，居德則忌也^[6]。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7]。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8]。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9]。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10]。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